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 2



台灣文學問題

殖民地的傷痕

呂正惠 ◎ 著

本書所收入的論文
大部分都在討論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
少部分涉及戰後初期政治轉換期間的文壇。
整個看來，
一九二〇年至四九年間，
台灣新文學
所產生的核心問題，
都跟日本的殖民統治密切相關……

葉石濤和戰後台灣文學的「斷層」與「跨越」

發現歐坦生……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一個側面

陳芳明「再殖民論」質疑

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研究的回顧……七〇年代以來台灣地區的研究概況

跨世紀台灣文化發展的展望……「脫亞入歐」，還是回歸本民族？

附錄

論楊逵的小說藝術

賴和三篇小說析論……兼論賴和作品的社會性格

ISBN 957-8660-75-8



9 789578 660755

定價

NT240元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 2

殖民地的傷痕

——台灣文學問題

呂正惠 著

人間出版社

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呂正惠著． --
初版． -- 台北市：人間， 2002[民 91]
面： 公分． --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 2)

ISBN 957-8660-75-8 (平裝)

1. 台灣文學 - 論文, 講詞等

820.7

91009742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 2

殖民地的傷痕

——台灣文學問題

著 者／呂正惠
發 行 人／陳映真
出 版 者／人間出版社
社 長／陳映和
地 址／台北市潮州街九一之九號五樓
電 話／02-23222357
郵撥帳號／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排 版／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漢大印刷有限公司
總 經 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汐止鎮大同路一段三六七號三樓
訂書專線／02-26418661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初版一刷／二〇〇二年六月
定 價／二四〇元

獨行江湖上梁山（代序）

本書所收入的論文大部份都在討論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少部份涉及戰後初期政治轉換期間的文壇。整個來看，一九二〇年至四九年間，台灣新文學所產生的核心問題，都跟日本的殖民統治密切相關，所以就採用了現在的書名。

就台灣的現代文學這一領域而言，我原本所熟悉的是戰後階段，特是六〇年代的現代主義，和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在九五年之前，我並沒有想到要把研究範圍擴及日據時期。在這之前的兩、三年之間，具台獨傾向的台灣文學論述逐漸在學院站穩腳步，看起來「前景」可以預期。不過，就我人的學術訓練而言，我總覺得他們的文章政治立場的宣揚大於學術的嚴謹性。所看的文章日漸增多，這種感覺也日漸加強。到了九五年終於忍不住想要轉移一下研究焦點。是人嘛，總有一點「不服氣」的心理。

這種經驗，我想從九三年那一篇台灣話文的「試筆」談起。那時候我剛讀完一本討論這一問題的碩士論文，所得的印象大出我的意料。根據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的說法，三〇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運動及台灣話文的提倡，可以看出，「台灣本身逐漸產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學的意念」。這本碩士論文原來是要進一步證成這一看法，但作者所引證的資料有很多卻與這一看法不一致，而作者在論述過程中也有些顯得搖擺不定。我把其中關係重大的資料，從更「原始」的出處找出來仔細閱讀，進一步證明我的「感覺」並沒有錯，於是寫成了本書的第一篇論文。

在這篇論文裡，我以許多原始資料證明，當時提倡和反對台

灣話文的正、反兩派，都非常關心「台灣話文」的寫作是否可以和「漢文」傳統保持連繫（贊成者認為可以，反對者擔心不行）。因此，他們隱而不宣的目的，就就在於對抗殖民當局所大力推揚的「日文」書寫。這種「民族」立場，顯然和葉石濤的說法大異其趣。

這篇論文在中正大學的一場研討會上宣讀時，一位和我頗有交情的「台獨」派學生在會後與我論辯，認為我的看法不能成立，但他又提不出有力的反證。現在我對三〇年代的這一場論戰了解得更為全面，知道應該作更廣闊的討論，但這一篇論文的論點，作為廣闊場面的某一方面，仍然站得住腳。

這篇論文建立了我的信心，於是，就在九五年下定決心「改行」（或「另兼一行」）。可是，當我這方面的論文篇數逐漸累積以後，卻沮喪的發現，我一切的「作為」如同「毫無作為」，人家視我如不存在。更糟糕的是，把我製作的一部車子重新改裝，他們有了一部新車，而我卻仍然一無所有。

這事就要從「台獨派」企圖為「皇民文學」翻案談起。譬如，鍾肇政說，「我們都是受害者」，「屈從型作家也是」，葉石濤竟然更進一步說，沒有「皇民文學」，全是「抗議文學」，這樣就把敢於反抗者和為私利而屈從者從「道德」上一律抹平了。

我並不想參加這種「形態」的論爭。從王昶雄的〈奔流〉（這篇並不是「皇民文學」）裡，我討論了當時台灣「部份」知識分子的一種認同困境：他們的「現代化」知識和習性全都來自日本的教育，他們現代化生活的「模範」是東京，最後他們把「現代化」和「皇民化」混淆了（這篇論文九五年發表）。我又以呂赫若為例（見本書論呂赫若第二篇論文，九六年發表），說明他如何認清這一困境，並為自己找到解決之道。這是想從歷史、社會背景來詮釋「皇民化」的問題所涉及的被殖民社會的認

同問題，而不想跳入一場「各標立場」的無謂的論爭。

我的關於〈奔流〉的論文發表後的第二年，施淑寫了一篇更精采的論文，題目叫〈首與體〉（後收入她的論文集時改名〈日據時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談到在殖民體系中，台灣知識分子如何陷入「內地」與「本島」對立的身份位階與認同的窘境中。

此後，台獨派年輕一代的學者（大部份是我的學生）紛紛討論「本土化」、「現代化」、「皇民化」的矛盾關係，討論到台灣文學中的「東京意象」，但在註釋卻見不到我和施淑兩篇的踪影，彷彿這是他們「獨創」的見解。他們的「改裝車」變成「全新」的高級車了。於是，幾年以後，從「政壇」轉入「學界」的陳芳明就可以「綜合」的寫出這樣的文學：

文化與國族的認同議題，散見於大部份作家的小說之中，呂赫若如此，張文環如此，戰爭期間的皇民化作家如陳火泉、周金波更是如此。這種認同的迫切與焦慮，源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傳播現代價值觀的影響。（《聯合文學》2001年8月號，161頁）

陳芳明反以此批評陳映真只會拘執於教條式的民族主義，而「不了解」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我所製作的「矛」原本是要攻擊他們的「盾」的，這下子，「矛」變成他們的，而我們則是被攻的「循」了。誰叫他們人多，而且還臉不紅、氣不粗的「竊其器」呢！

於是，我這五、六年來努力的成果就這樣「泡湯」了。關心我的少數朋友，由於不同行、不了解內情，常批評我說：「你這幾年到底在幹什麼？只會買CD、寫一些無聊文章，研究都不做了嗎？」我真是啞吧吃了黃蓮啊！（於是，就只好喝更多的酒。）

還好，我寫的有些東西他們是無法「消化」的。在論葉石濤一文裡，我談到他們常常誇大宣傳的「跨越語言」的「實情」。在駁陳芳明「再殖民論」一文第一大段的最後一小節中，對此又有進一步的發揮。關於這一點，以及關於對整個「再殖民論」的批駁，他們一定會由於無法「消化」而置之不理。那就由他們去罷！

由於以上所述的原因，本書所收的每一篇文章都附上詳細的發表日期，主要是避免別人誤以為，我怎麼還在談人家「已談過」的話題。我很高興，在長期的沮喪與鬱悶之後，終於把這本書編集出來，而且就要出版了。此後兩年，我打算寫出1920-1949的台灣文學史。既然都已獨行上了梁山泊，那就堅持到底罷！

2002.5.13 凌晨

目 錄

三十年代「台灣話文」運動平議	1
龍瑛宗小說中的小知識分子形象	17
皇民化與現代化的糾葛	
——王昶雄〈奔流〉的另一種讀法	31
殉道者	
——呂赫若小說的「歷史哲學」及其歷史道路	41
「皇民化」與「決戰」下的追索	
——呂赫若戰爭時期小說的「抵抗」模式	67
殖民地的傷痕：脫亞入歐論與皇民化教育	89
被歷史命運播弄的人們	
——論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105
葉石濤和戰後台灣文學的「斷層」與「跨越」	119
發現歐坦生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一個側面	135
陳芳明「再殖民論」質疑	147
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研究的回顧	
——七〇年代以來台灣地區的研究概況	199

跨世紀台灣文化發展的展望	
——「脫亞入歐」，還是回歸本民族？	229
附錄	
論楊逵的小說藝術	243
賴和三篇小說析論	
——兼論賴和作品的社會性格	257

三十年代「台灣話文」運動平議

近年來台灣意識高漲，台灣文學「主體性」的提法得到許多回響。在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中「台灣話文」的提倡無疑是較有爭議、較引人注目的一項。因為有了這個背景，六十多年前發生在日據時代的、一場有關台灣話文的運動與論戰，也重新引發了人們的注意。

台灣文學論者在發掘過去這一段歷史時，不免會受到現在的立場的影響，「以今律古」，在詮釋方面多多少少扭曲了歷史的真相。譬如，最早提到台灣文學「主體性」、並努力為「台灣文學」正名的葉石濤，對於日據時代的「台灣話文」運動就說出了下列的論斷：

在這主要活動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得出除受大陸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外，台灣本身逐漸產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學的意念。¹

這就可以看出，葉石濤是把「台灣話文」運動和相關的「鄉土文學」運動，當做台灣文學在中國文學之外追求「自主性」的開始。

葉石濤雖然有這樣的想法，不過，在《台灣文學史綱》中，

1 《台灣文學史綱》，文學界雜誌社，1987，28頁。

他仍然不趨於極端，儘可能把有關這一運動的各個方面加以交待。但，後來的有關論著裡，有一些乾脆就認為，這一運動證明了，30年代的台灣文學已經具有了不同於中國文學的「主體性」。

本文作者並不認為，30年代「台灣話文」的提倡者，在意識形態上已經和80年代的台灣文學論者一樣，目的是要建立台灣文學的「自主性」。本文想要從「回歸歷史」的立場，綜合現在所能看到的原始史料，分析當時論戰雙方所面對的問題，從而追索這一運動在當時所以發生的歷史因素。當然，本文作者也有自己的立場，在詮釋歷史時難免會受到這種立場的影響。本人希望自己在這一方面有充分的自覺，在分析時儘可能的客觀。

一、

台灣話文問題的根源，在台灣新文學運動初起時就已露出端倪。提倡新文學的台灣文學家，受到大陸新文學運動的影響，主張以白話文來取代言言文。當時反對這種主張的人，有一種意見是很值得注意的。譬如，鄭軍我在反駁力主白話文學的張我軍時，說道：

足下希望通行之所謂白話文者，其實乃北京語耳……倘必拘泥官音，強易我等為我們，最好為很好，是多費一番週折，捨近圖遠，直畫蛇添足耳。²

2 〈致張我軍一郎書〉，轉引自廖毓文，〈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以下簡稱〈史略〉），見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5·文獻資料選集〉（以下簡稱《文獻資料集》），明潭出版社，1978，408頁。

鄭軍我提出了在台灣推行白話文的根本困難：張我軍等人所提倡的白話文是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官話，而大部分台灣人日常所講的卻是「台灣話」（即閩南語），他們不會講官話。這樣，所謂的「白話文」又何從提倡，何從應用呢？陳福全更進一步的指出，台灣三百餘萬的人口，懂得官話的萬人難求其一，他說：

如台灣之為白話者……觀之不能成文，讀之不能成聲，其故云何？蓋以鄉談土音而雜以官話……苟欲白話文之適用於台灣者，非統一語言未由也。³

陳福全「統一語言」的觀念從現在看來當然有問題，但他無疑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即：提倡白話文的基礎是，大家要會講官話。

如果我們對照大陸白話文學運動的反對者的意見，就可以看出，鄭軍我和陳福全的看法是很「特殊」的。其實，在大陸白話文的爭論中，不論正、反兩方，有許多人也都有「鄉談土音」，譬如胡適、陳獨秀都是安徽人，他們的安徽話並不同於官話。但是，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方言和官話的差異問題，而反對者也不拿這一點來攻擊白話文之不可行，其情況迥異於陳福全、鄭我軍之「充分自覺」，這一點是很值得我們思索的。

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在於：大陸的知識分子比台灣的知識分子更熟悉官話，他們講官話也許帶著濃厚的「鄉音」，但基本上他們都會講官話。而且，明、清以來，以官話為基礎的白話文學（特別是小說），作品源源不絕，大陸知識分子對於這一傳統的熟悉程度，無疑也要高於台灣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在清朝末年的革命熱潮中，為了宣傳的便利，白話報已經相當普

3 〈白話文適用於台灣否〉，轉引自〈史略〉，見《文獻資料集》，469頁。

遍，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在這種氣氛之下長大的。對於大陸知識分子來說，官話白話文已經不是問題，但對台灣知識分子來說，應用起來還是具有重大困難度的問題。

因為這個緣故，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知識分子所寫的「白話文」不夠道地，出現不少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對於這種現象，當時在上海留學的施文杞和林唯耕都注意到了。施文杞批評說：

我在《台灣民報》上，讀著有些台灣人做的白話文，時常有不懂的地方，不單是文法弄錯，也有時用到全沒有意思的語句。⁴

林唯耕（筆名「逸民」）則希望：

在台灣熱心提倡白話文的諸位先生，在台灣多設幾處研究國語（中國國語）的機關，應時勢的要求，補其不足，把已萌芽的白話文推廣一步。⁵

從這裡就可以側面看出，對日據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官話白話文的使用，確實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首要責任，當然不在於台灣的知識分子。就漢文化的拓展而言，台灣無疑是較邊遠而「落後」的地區，台灣知識分子對漢文的使用能力，一般而言，無法與漢文化的中心區相比，這是可以理解。但如果台灣一直由中國治理，隨著文化交流

4 〈對於台灣人做的白話文的我見〉，見《文獻資料集》，52頁。

5 〈對在台灣研究白話文的我見〉，轉引自〈史略〉，見《文獻資料集》，466頁。

的進展，台灣知識分子在這方面的能力也會與日俱增。所以，造成台灣知識分子對官話及白話文陌生的最根本原因，還在於甲午戰敗割台，以及其後日本在台灣的語文教育政策。

日本人統治台灣，當然不希望台灣人繼續學漢文。為了消除台灣人對中國的民族、文化的認同感，他們當然要設立種種限制，讓台灣人不容易學習漢文。並且強迫或鼓勵台灣人學日文，以達到同化的目的⁶。在這種情形下，會使用漢文的台灣知識分子，恐怕對於從古書學來的文言還比較熟悉；對於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官話白話文之力不從心，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也就是鄭軍我和陳福全據此以反對白話文的原因。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方向論證官話白話文和教育之間的密切關係。事實上在大陸，一般沒有過教育的民衆，基本上也只會講他們的地方話，而不會講官話，其情形正如台灣民衆一般。大陸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使得北洋政府也不得不下令各級中、小學開始學習白話文。在現代義務教育的推導下，以前以官場使用為主的「官話」，現在逐漸成為中國各方言區互溝通的「普通話」（或稱「國語」）。白話文運動再加上現代的義務教育，才使得白話文學在全中國普及起來，也才使得高級知識分子之外的廣大的中國民衆，可以有了相互溝通的「語言橋樑」。

然而，這一切在台灣都不可能進行。日本人不但不會允許在台灣施行官話白文教育——這將促成台灣和大陸的一體感——而且還要加以阻撓。在這種情形下，連知識分子使用起官話及白話文都有困難，更不要說一般民衆了。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就可以想像日據時代台灣人的困境了。他們對漢文愈來愈不熟悉，甚至連學習一般中國人所講的「普通

6 關於日本殖民政府大力推廣日語、壓抑漢語的情況，請參閱廖祺正，《三十年代台灣鄉土語文運》，成功大學史語所碩士論文，1990。

話」的機會都沒有（除非到大陸去「留學」）；另一方面，他們所常講的閩南話或客家話（原住民的情況當然要另外討論了），又有許多有聲無字，寫不出來（這是就整體而論）。各級學堂，在日本人有意識的推動下，又都以應用日文為主。長期下來，台灣人豈不變成要以「外國文」來表達感情、思想了嗎？為了保持自己的族群特色，為了不和漢文化完全斷絕關係，提倡「台灣話文」不就變成唯一可行的道路了嗎？

二、

如果就記錄台灣（閩南話）的立場來說，「台灣話文」恐怕還不是最簡便的途徑。假如想要「就音以求字」，要找出那一個台灣話應該以那個字（甚至那個古字）來表現，就要像連橫的《台語考釋》一樣，花很多功夫去考證。假如找不到字，又必須「造字」。而且，更重要的，當我們要以漢字來表現台語時，這樣的「漢文系統」勢必要和表現官話的「漢文系統」產生混淆作用，增加閱讀的難度。純粹就記錄台語來說，「台灣話文」並不是最簡便的選擇。

就記音的立場來說，最方便的莫過於「台語羅馬字」。這種記音系統，早在十九世紀中期，就已經由在福建閩南地區傳教的基督教長老會教士創立了。這種系統，後來又由長老會帶到台灣來，並且行之有年。

在「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前，後來成為協會主要領導人之一的蔡培火，就已經開始推廣「台語羅馬字」。協會成立之後，蔡培火再度提出普及羅馬字的建議，但協會其他幹部多傾向於普及漢文。後來，協會也決定開始推廣羅馬字，但效果始終不彰。⁷

日本人對推行羅馬字的行動，基本上也是心存疑慮，加以種

種限制。但是，這並不是這一運動不成功的唯一原因。葉石濤在談到蔡培火的努力時，這樣說：

以蔡培火為首的基督教徒是主張用羅馬字去書寫台灣口語的（1927年1月）。可惜，這違背了民眾的民族意識，只在一部分台灣新教徒中流行，未能成為普及化的工具。⁸

另外，廖祺正對蔡培火的工作的挫折，除了提到總督府的壓迫、阻撓外，也下了這樣的結論：

蓋當時從事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均懷有強烈的民族思想，對於非我族類的文字心生排斥。⁹

相對於「台灣話文」運動來講，「台語羅馬字」運動明顯較受忽視，這可以間接證明，「台灣話文」運動無論如何還是有：在日本人統治之下保存漢文化的用意。

在大陸，也有與「台語羅馬字」平行的「國語羅馬字」的運動。其動機是：漢字難記難學，不如羅馬字記音簡便。但經過語言學家的試驗以後，他發現：以羅馬字寫「國語」，雖然方便得多，但閱讀起來，困難度卻大增。這是因為漢語基本上以單音詞及雙音詞為主，同音詞太多，辨識上有很大的困難。所以，後來就放棄了。¹⁰

台語（「閩南話」）既是漢語方言的一支，以羅馬字來記台

7 關於羅馬字運動的經過，請參閱廖毓文，〈史略〉第3節，《文獻資料集》，470-482頁。

8 《台灣文學史綱》，26頁。

9 《三十年代台灣鄉土話文運動》，38頁。